

中国游艺史

一、远古时期产生的游艺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游戏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茹毛饮血、巢穴而居的远古时代，先民们就围着篝火手舞足蹈，这可能就是最原始的游戏形式。为了捕捉猎物，人们发明了弓箭，从而产生了射箭的游戏；为了耕种作物，人们击壤抛耒；为了取食裹腹，人们垂钓；为了争抢地盘，人们互相搏斗、摔跤；为了渡过河流，到达物草丰美的彼岸，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人们游泳……实际上，游戏就是随着生产和生活的进步而渐渐发展起来的。

围棋

围棋作为一种体育娱乐棋类游戏，在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其民间影响也非常大。

对于围棋的起源问题人们众说纷纭。《世本·作篇》认为围棋是尧发明的，在《博物志》中，晋人张华说“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而据《潜确类书》：“夏人乌曹作围棋”。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相信这几种说法，它们可能夹杂了后人的附会，但至少它们告诉我们围棋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按照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说法：“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

争伪之道 ,当纵横者流之作矣 ”。也就是说 ,围棋是战国纵横家发明的。事实上 ,这种观点更不足信 ,因为围棋已屡次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另外 ,《论语·阳货》中有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 ?”《孟子·告子上》提到一个围棋高手 ,名叫弈秋 ,说 :“弈秋 ,通国之善弈者也。”显而易见 ,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 ,围棋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娱乐项目 ,那么照此推断 ,围棋的起源肯定在春秋之前。

围棋手在汉代时已有等级之分。桓谭《新论》上说 ,围棋手有上中下三等之分 ,此时的围棋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棋圣 ”的称号也开始出现 ,如汉末三国时期的严子卿、马绥明等人就有“棋圣 ”之称。那么棋圣是什么呢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解释说 :“故善围棋之无比者 ,则谓之棋圣。”“棋圣 ”即天下无可匹敌的高手。三国时 ,棋艺被邯郸淳分为九品 ,棋手们的棋艺高下就据此品而定。“入神 ”是最高级别 ,此时棋艺已达到“变化不测而能先知 ,精义入神 ”的境界 ;“坐照 ”、“具体 ”、“通幽 ”、“用智 ”、“小巧 ”、“斗力 ”、“若愚 ”及“守拙 ”依次列于其下。《南史·柳惔传》中说南朝梁武帝喜欢下围棋 ,“使惔品定棋谱 ,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 ,第其优劣 ”。南朝时 ,还设有围棋州邑 ,有专人担任大中正、小中正等官职 ,负责围棋九品制的管理。

历代帝王中不乏围棋爱好者 ,这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围棋的发展。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宋明帝刘彧、齐武帝萧赜、梁武帝萧衍等都酷爱围棋。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 ,在宫中设置号称“国手 ”的“棋待诏 ” ,这些“待诏 ”的职责就是与帝王对弈 ,代表当时最高棋艺水平唐代的棋待诏即文

学侍从技艺 ,由翰林院负责 ,官阶同九品。王积薪便是玄宗时代的最著名的棋待诏 ,历史上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趣闻。根据史策记载 ,他总是带棋具出游 ,在路上即使碰到一个农夫也要拉着下一盘。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入蜀避难 ,也没忘了让王积薪同行 ,可见他有多么喜爱王积薪和围棋。

到了唐宋时期 ,围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全国盛行对弈 ,帝王与国手对弈姑且不说 ,国手们也时与民间棋手一博高低 ,宴请外国宾客时 ,围棋竟然还成了一种娱乐项目。围棋在明清时期又达到一个高峰。明初 ,围棋得到了君臣们的青睐 ,如今位于南京莫愁湖公园内的“ 胜棋楼 ” ,据说就是为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在弈棋时赢朱元璋而建的。在各种笔记典籍中 ,随处可见有关明代知名棋手的记载 ,过百龄是其中最著名的。

随着围棋运动的广泛开展 ,各种棋风和流派便随之形成 ,其中首屈一指的便有正德、嘉靖年间形成的著名的永嘉、新安和京师三派。与此同时 ,明代还出现了一批围棋专著 ,其价值颇高的有陆无宇辑《 仙机武库 》、许谷辑《 石室仙机 》等。清代更不乏围棋好手 ,围棋名著刊刻也很流行。康熙、乾隆时期有“ 棋圣 ”之称的范西屏 ,5岁时就已经是国手 ,天下无敌 ,全国有名《 桃花泉棋谱 》就是他的著作。能与他一决高低的只有施定庵 ,著有《 弈理指归 》。在当时的弈界 ,言必称施范。他们二人都是海昌(今浙江海宁)人 ,所以后人称他们为“ 海昌二妙 ”。

大约在西汉时 ,中国的围棋传入印度 ,公元 远世纪前后它又传入日本 ,在日本风靡很久。

围棋艺术与军事艺术是有一定关系的 ,可能在人们思考

战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围棋。很明显的例子如 ,围棋如何落子以及最后怎样计算胜负 ,都与古代的作战方略相一致。这可能和战国到秦汉间频繁的战争有一定联系。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世有围棋之戏 ,或言是兵法之类。”马融《围棋赋》的阐述更进一步：“略观围棋兮 ,法于用兵 ;三尺之局兮 ,为战斗场 ;陈聚士卒兮 ,两敌相当 ;拙者无功兮 ,弱者先亡。”围棋盘就是一个小战场 ,下围棋则是用兵作战。因此 ,古代的一些军事战略家、指挥家本身就是围棋爱好者 ,而且往往棋艺很高。如汉高祖刘邦 ,建立汉朝以后还与戚夫人在长安宫饮酒弈棋。三国时 ,魏国有曹操、曹丕父子 ,东吴有孙策、诸葛瑾、陆逊 ,蜀国有费祎 ,他们有的是一代枭雄 ,有的是名震一时的谋臣统帅 ,但是对弈理都颇为精通。王粲是著名的汉末“建安七子”之一 ,很久以来他的诗赋脍炙人口 ,但人们往往忽略 ,他同时对围棋也很有研究。据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 ,他博闻强识 ,记忆力很强 ,能做到过目不忘。他曾经“观人围棋 ,局坏 ,粲为复之。棋者不信 ,以帕盖局 ,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 ,不误一道。”虽然王粲的记忆力很惊人 ,但如果他不熟知围棋之盘式、着法等 ,他就不能做到过目不忘 ,重新复局而不错一子。围棋史上还有一段佳话 ,即东晋王朝的重臣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键时刻 ,面不改色地几次与宾客下棋。而正是在东晋 ,围棋被封了“坐隐”、“手谈”与“忘忧”这样几个名士化的雅号。

围棋的历史非常悠久 ,其流传也很广泛 ,所以许多有趣的别名便伴随它的传播而产生 ;“坐隐”、“手谈”、“忘忧”、“鸟鹭”、“方圆”、“玄玄”、“木野狐”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别名。

《世说新语·巧艺》中有“坐隐”、“手谈”之说：“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手谈”在古诗中有这样的描写：“纤纤中指夹食指，运筹棋子乃斗智。一局棋罢两相识，此情此谊复谁知。”

《晋书·祖纳传》中可见“忘忧”的说法：“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对曰：‘我亦忘忧耳。’”这个别号取自围棋的娱乐功能，弈者对此很是喜欢，常将它挂在嘴边。

棋子有黑白两色，因此称其为“乌鹭”，黑子如乌鸦，白子如鹭鹭。

再看围棋的棋具，棋盘呈方形，棋子棋盒则呈圆形，因而又可以称围棋为“方圆”。

“玄玄”之说则见于《玄玄棋经》，围棋棋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相同的，其间变化绝无雷同，此说取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拊掌录》中称围棋为“木野狐”，是种贬义称法。据说宋人叶清非常喜欢下围棋，为此王安石曾作诗批评他，但叶仍沉湎于围棋，最后荒废了功业，当时人就以“木野狐”称围棋，是指围棋象狐狸精一样迷惑于人。

除此之外，同样因为围棋对人有迷惑而起的别名还有“烂柯”，至今爱好下围棋的人还喜欢这样称呼围棋。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个进山采樵的人，看见两个对弈的老人，心里一动，便停下来观棋，待杀完一盘，回顾身后，发现斧柄已烂。这就是“洞中一盘棋，世上数千年”。

现在已很难确定围棋最早的制局是怎样的了。邯郸淳在《艺经》中描述的棋局已经是“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

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三国吴人韦昭在《博弈论》中称：“枯棋三百。”东晋葛洪《围棋赋》中也说：“三百惟群。”由此可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十七道围棋盘。大约到了唐代，局道纵横各加一道，由十七道变为十八道。宋代，再增一道为十九道，局道的演变终于完成了。现在的局道仍为十九道，交叉点三百六十一个。棋盘变大，棋子变多，说明棋局具有更加复杂的变化，也标志着棋艺水平的提高。

象棋

古代称象棋为“象戏”；“橘中秘”、“橘中乐”也是古代的两种叫法。在《玄怪录》中，唐朝宰相牛僧孺曾经描述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巴邛人橘园，霜后两橘大如三斗盎。剖开，有二老叟相对象戏，谈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后来，人们正是根据这个故事，才以“橘中戏”、“橘中趣”来命名象棋。

中国象棋的历史也较悠久，我们无从确考它的起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源自神农氏。《续藏经》中说：“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朝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棋矣。”

二、源自黄帝。宋人晁补之在《广象戏格·序》中说：“黄帝之战，驱猛兽以为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以象戏名之。”

三、源自虞舜。据这种说法，舜造象棋来教他的儿子商均，另一说法是教其同父异母名叫“象”的弟弟，这才有“象棋”之说。

四、源自武王。按照周礼的兵制，五人为伍，象棋各用兵

卒五名 ,与周朝兵制相仿。

五、源自印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象不产于中国 ,而产于印度。

关于象棋的记载 ,战国时的典籍中就已经有了 ,宋玉《楚辞·招魂》中就可见到“菑蔽象棋 ,有六博些”的说法。另外 ,汉代刘向的《说苑·善说》中记载雍门周曾经这样对孟尝君说：“足下燕居 ,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照一些学者的看法 ,雍门周口中所说的“象棋” ,并不是后世的象棋 ,而是指六博中用象牙做的棋子。但有个事实不容争辩 ,即后世的象棋源于古代军事战争。另外 ,由于“楚汉相争 ,韩信作象棋以教士兵”传说的影响 ,后人在象棋棋盘里附加了“楚河汉界”这个名称。南北朝时 ,文学家庾信写了《象棋经赋》 ,北周武帝宇文邕则创制了《象经》。普遍的看法是 ,我国象棋的祖形便是南北朝时的象棋。

北宋后期 ,现代象棋才真正定型。象棋的发展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宋时的兵种又多了“偏”、“裨”二将 ,他们的行棋方法与现代象棋的“士”、“象”差不多。宋高宗时与咸的和尚曾说：“今以板画路 ,中间界之以河 ,各设十六子 :卒、炮、车、马、象等 ,俗谓象棋者是也。”另外再加上李清照《打马图经》附刻的象棋盘 ,这两者足可证明当时的象棋与今天的象棋已基本一样了。

在宋代 ,象棋完成了一系列改革 ,其趣味性也有所增强。到了南宋 ,它几乎走入了每家每户。不管是民众还是文人雅士都很喜欢它 ,南宋的刘克庄、文天祥等文人就是象棋迷。刘克庄还曾作了一首《象棋诗》：

屹然两国立 限以大河界。
三十二子者 一一俱变态。
运炮无虚发 冗卒要精汰。
昆阳以象奔 陈涛以车败。
匹马郭令来 一士汲黯在。
献虏将策勋 得隽众称快。

宋代大理学家程颢也曾作了一首《咏象戏》诗：

大都博弈皆戏剧 象戏翻能学用兵。
车马当存周战法 偏裨皆备汉官名。
中军八面将军重 河外尖斜步卒轻。
却凭纹揪聊自笑 雄为刘项亦闲争！

在《北狩见闻录》中宋人曹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金兵将宋徽宗及后妃们掳到北方，那个时候，康王赵构已在河南即位的消息还没传到大家的耳朵里，韦妃曾经用象棋占卜。她用黄罗包住棋盘，在纸上写下“康王”二字，然后将其贴在“将”棋上，焚香祷告：“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说完把“将”子一掷，那枚将子果然落在九宫之内。我们当然不会完全相信这个故事，但至少可以由此得知北宋末年宫廷中已盛行象棋。

明清时，象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嘉靖年间的大名士李开先是一代棋王，就连一些国手棋杰也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他非常自豪地在《前象棋歌》中说：“吾以棋名擅天下，后先

访者纷相望。”象棋在清代的民间更为普及，清人所写《象棋歌》中就有“市夫牧童靡不能”，的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乾隆年间涌现了大量的象棋高手，所谓九大流派也形成于此，他们互相竞争，切磋棋艺，大大提高了棋艺水平。明清不少象棋著作也纷纷涌现出来，如《适情雅趣》，徐兰著；《橘中秘》，朱晋桢著；《梅花谱》，王再越著；《竹香斋象戏谱》，张乔栋著等。这些象棋著作对于象棋的普遍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象棋在广大民间已非常普及。不管是街头巷尾，还是河滨柳荫，或是茶馆棋室，到处都有捉对厮杀者和围观者的身影，在一场场紧张激烈的鏖战中，人们的身心得到了休息。由于它产生和形成于中国大地上，所以又称它为“中国象棋”。

獾陆壤、抛噍

“击壤”这种游戏非常古老，古老到没法确定它的起源。传说在远古时代，天下在帝尧的统治下，一片太平，老百姓无忧无虑地生活。利用耕作休息的时间，一群老年农夫借着柳荫玩起了击壤游戏，他们边玩边唱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中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幅远古时代安闲、恬静的野老歌耕图顿时跃然纸上。一直以来人们都不怎么了解秦汉以前的击壤游戏，但到

了汉魏之时,人们根据《风俗通》、《艺经》、《逸士传》、《风土记》等古籍的记载,对击壤游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壤,是一种抛击物,由木头制成,前阔后狭,状如草鞋,约一尺四寸长,三寸宽。击壤,按照它的意思,即以“壤”相击。游戏是这样的:先将一壤斜插在三四十步外的地上,再用手中所拿的壤掷击它,中则赢,反之则输。

民间广泛流传击壤游戏,前人也多在诗歌中赞咏它。晋人张协《七命》诗描述了老人们玩击壤游戏的场面:“玄韶巷歌,黄发击壤。”古时常以歌谣相伴游戏,击壤也不例外,差不多每击必歌。唐代李峤在《喜雨歌》中说:“野洽如抵泳,途喧击壤讴。”宋人范成大也有“谁知细细青青草,中有丰年击壤声”的诗句。

抛掷这种游戏在清代时仍很流行,可谓老少皆宜。赵翼是清代乾嘉时著名的史学家和诗人,他在步入老年之后,对童年时天真烂漫的抛掷游戏依然念念不忘,在《春兴》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感情的流露:“自笑童心除未尽,拔河抛掷尚能嬉。”

清代周亮工的《书影》对当时南京儿童的“击棒壤”作了一番介绍。其中有这样一段:“秣陵童谣,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击棒壤’。”由此可以得知,当时秋天天气转凉时节,便可进行击壤游戏。周亮工也对当时击壤的方法作了一番描述,并重新解释了击壤名称的由来:

《博艺经》所云长尺四者,盖手中所持木;阔三寸者,盖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为一,遂令后人不知为何物矣。

阔三寸者 ,两首微锐 ,先置之地 ,以棒击之 ,壤上之木方跃起 ,后迎击之 ,中其节 ,木乃远去。击不中者为负 ,中不远者为负 ,后击者较前击者尤远 ,则前击者亦负。其将击也 ,必先击地以取势 ,故谓之击壤云。

根据周亮工的意思 ,两种玩具棒是有区别的 :长一尺四寸的一根为击棒 ,阔三寸的为被击棒 ,两头有点尖。游戏时 ,将被击棒的一半放在挖出的小土堆上 ,一半悬于土堆下的小坑上方。然后用长棒给短棒的悬空部位以猛力一击。受此一击 ,短棒腾起 ,趁它落下之前 ,再用长棒击它 ,短棒就向远处飞去。没有击中 ,或击中却仍落在原地者算输家 ;前面击中的人 ,即使短棒飞得很远 ,但如果后面的人超过了他 ,那后面的人仍算赢家 ,谁击得最远谁就是赢家。击棒壤者往往在击小棒悬空部位前 ,总是先狠击地上 ,这是为了“取势” ,也就是做好那一击的准备 ,把力气更好地使出来。

现在 ,中国一些地区仍然流行这种击壤游戏。记得孩提时代 ,同村的孩子中流行现一种叫“丢庄”的游戏。游戏是这样玩的 :先把一根小树枝或一棵很长的草当做“庄” ,将它的一半埋在有坡度的泥土中。又用镰刀在离“庄”几米处划一条线或挖一小坑 ,即投掷点。玩者站在投掷点处 ,将手中的镰刀向“庄”扔去 ,掷得离“庄”最近的人就是胜者。然而 ,这种游戏有博的性质在内 ,玩的时候往往以一把草作为赌注 ,因为小伙伴们在山上割草时多半会玩这种游戏 ,所以胜利者即使并没有亲自割多少草 ,但回家时仍能够背上满满一筐草。现在看来 ,这种游戏和击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可能是击壤

的一个变种吧。除此之外,在湘西永顺、龙山、桑植一带的哈尼族流传着一种传统游戏,叫“打飞棒”,也可以看到古击壤游戏的影迹,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也曾经表演过精彩的“打飞棒”游戏。

抛虚的另一叫法是“飞虚”;“抛垛”则是其别写,这种投掷游戏是由击壤衍生出的。砖石瓦块即为“虚”。在《俗言·抛虚》中,明人杨慎这样描述:“宋世寒食有抛虚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若今之打瓦也。”宋人诗文中也曾出现抛虚之名。宋人张侃曾作诗《代吴儿作小至后九九诗八解》:“五五三三抛虚忙,柳丝深处映陂塘。梅尧臣的《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也这样咏道:“窈窕踏歌相把袂,轻浮赌胜各飞虚。”这些诗表明,除了砖瓦替代了壤木,抛虚和击壤几乎没有区别。

灋射、投壶

考古学上的资料告诉我们,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老祖宗就已发明了弓箭。弓箭有了,当然就少不了善于摆弄弓箭的人。中国古代便已有了“羿射十日”的传说,羿的箭术便很高明。这说明很早就有了射箭这一活动。

最初是在狩猎时用到弓箭的,主要是用来射杀飞禽走兽。后来,社会不停地向前发展,它的用途也随之不断扩大,在军事和礼仪中也逐渐运用了弓箭。古代社会,作为一个“士”,其基本要求之一便是掌握射艺。射礼也是周代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当时的“士”,须掌握包括射术在内的六项基本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射在周之前的殷代已经受到了重视。殷代称学校为“序”,《孟子·滕文公上》说:“序者,

射也。”序也包含射的意思。虽然学校学射和军中习射的技术差别不大 ,但学校对与之有关的礼仪和道德教育则更为重视。意思就是 ,射有射仪、射德。《礼记·射义》是这样记载射箭的姿势及礼仪的 :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 ,内志正 ,外体直 ,然后持弓矢审固 ,持弓矢审固 ,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文献上说 ,在周代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贵族阶层 ,用来选拔善射之士的礼仪即为大射 ,诸侯来朝或诸侯相朝时的礼仪即为宾射 ,贵族在平时娱乐时则行燕射 ,卿大夫、士及普通百姓中则行乡射 ,主要是用来练习射艺。任何人不能僭越这四种等级森严的射礼 ,所以即便孔子提倡温、良、恭、俭、让 ,对于射礼问题也毫不含糊 ,寸步不让。他的《论语·八佾》篇是这样说的 :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 ,下而饮 ,其争也君子。

射礼“树侯而射” ,侯是用布或皮革做成的箭靶 ,并在上面画上熊、虎、豹、鹿等各种野兽形状 ,它的形制根据射者身份的高低而定。所谓“鹄” ,便是箭靶的中心 ,所以又称射侯为射鹄。本来射侯是为礼而设 ,但游戏赌酒时也可用它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就有这样的记载 :

射夫既同 献尔发功 发彼有的 以祈尔爵。

意思是 射手会集在一起比赛 把自己的射箭本领表现出来 ,如果射中目标 就可以罚对手喝酒。这样 ,就给射侯染上了较浓的娱乐性 射箭游戏也趋于正规。射箭游戏有很多种类 这里主要对射鹄、射柳以及比较文雅的投壶等作一介绍。

射鹄还有一个别名叫“射鼓”,其实也就是射箭。《礼记·射义》中说:“故射者各射己之鹄。”

清代时 北京城已相当流行射鹄 不但士大夫有自己的射圃 市井中也有公共射箭场所供百姓所用 《天咫偶闻》、《清稗类钞》等书对此都曾作过描写。当时〔射鸽子〕曲在百本张抄本子弟书中还有专列 曲中是这样唱述箭场中的设置的 在一个四面环墙的院落中 ; 有个平台儿 ,小小五间盖在正北 ,将那鹄棚、箭挡儿都设在正南”。“棚东”就是开箭场的。一般都是些富家子弟前来射鹄 ,弓箭都是自带的 在箭场中一决输赢。这样的鹄场 ,往往都是以射为赌 ,门前总有“步靶候教”几个大字。清朝政府多次下达的禁赌令中 ,多种赌博游戏均在被禁之列 ,而射赌却是一个例外。《清稗类钞·技勇类》是这样描述八塘夷人柳林较射的 :

巴塘清真寺下有柳数百株 夷人于秋后往往居林内 ,终日较射赌酒以为乐。每值八月既望 夷人辄支布为鹄 ,于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 连中三次者 群具酒饮之。

这和京师的射鹄差别并不是很大。

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射鹄的新花样层出不穷。比如,要求射者将箭射在靶上,射成花篮的形状,即为“射花篮”。在晚上,射者瞄准悬在空中的香火,将其射灭,即为“射香火”。悬一寸见方的薄绸,要求不但射中而且穿透,即为“射绸”。还有一种叫“射羊眼”的射鹄,其目标非常小,清代有一位叫果益亭的将军,特别擅长射羊眼,因此被称为“果羊眼”。对于这些射箭游戏,射箭者力的大小并不是重要的,射手的技艺程度,用巧及箭法的好坏才是其所看重的。

还有一种叫做“射柳”的射箭游戏,它是一种与风俗节令有关的古鲜卑族风俗。《史记·匈奴传》有“秋,马肥,大会茷林”的记载。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茷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树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至,此其遗法。”在《演繁露》中,宋人程大昌说“其于驰蛄之外加弓矢焉”,这就是射柳。因此,古代又把射柳称作“蛄柳”。契丹人有一种叫做“瑟瑟仪”的春天祈雨的风俗,射柳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辽史·礼志》对此就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又翌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

辽代举行瑟瑟仪的祭典上进行的这种射柳活动,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还不能视其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游戏

活动。金人建立国家后，仍不改辽人旧俗，在重五、中元、重九三个节令行拜天之礼，其中射柳之戏也存在于重五拜天之礼中。《金史·礼志》记载：

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朶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

不过，不能把这种箭等同于平时所用的箭，“横镞”是书中对这种箭的称呼，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是这样描述横镞的形状的：“其矢镞阔于常镞，略可寸许，中之辄断。”即射柳用的箭的箭头是铲形的，比一般用箭的箭头要宽，所以一般说，只要射中柳枝，都能将其射断。虽然射柳的箭镞阔于常镞，但是因为柳枝和飞马的状态都不稳定，所以要想射中较细的柳枝达到目的，高超的箭法和骑术缺一不可。

射鹄游戏在明清时代更是风靡一时，朝野上下几乎无人不喜，当时的笔记小说、诗词俚曲对此多有记载。清人李声振的《百戏竹枝词》中有一首《射鼓》专咏清人射鹄，诗云：

熊虎为俟此滥觞，连环绣革试穿杨。

太平脱剑军鼙息，却忆昆仑狄武襄。